

顿悟人生丛书

甚名誰姓



伍松乔◎著

四川

「对于报人而言，新闻是丈夫，一朝出嫁，从一而终；散文是情人，心有所系，却不能朝夕与共。和散文

姓甚名誰



柏拉图式的挽着手散它几回步，也算
是繾綣风流吧？」



伍松乔 著

主编 戴善奎

姓甚名谁

顿悟人生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成都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何秉忠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式设计：黄世清

姓 甚 名 谁

伍松乔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新华书店经销

绵竹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张 4.375 字数 95 千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1969-6/G·324 印数：1—10000

定价：3.20 元

目 录

自序	(3)
有戏	(5)
热闹之最	(11)
近墨者言	(15)
不敢下镬池	(18)
同时进行	(24)
绕着走	(28)
好去处	(30)
闭户	(32)
稍息	(36)
迷茫晨光	(38)
右边那坟	(44)
姓甚名谁	(48)
所谓潇洒	(55)
天上人间	(59)
撞煞	(72)
悬剑	(75)
高高的标点	(84)

克芹同志不能来·····	(87)
退稿可畏·····	(90)
并非泼水节·····	(96)
湖畔行吟·····	(102)
听蔡志忠嚼菜根·····	(105)
矮丘陵侧记·····	(107)
君子生前身后事·····	(115)
珠江不是一条江·····	(125)
朦胧河·····	(129)
听杜鹃鸣·····	(132)
其始也简：兴业路 76 号 ·····	(134)

自序

序言的位置类似报纸的“报眼”，这块宝地不用来装自己的广告词，真是太可惜了。

于是，写以下的话。

先说书名。

我姓伍，名松乔，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居然一度也成了问题，《姓甚名谁》一文记叙了这件并非杜撰的小插曲。用“姓甚名谁”来作这本散文集的书名，与这篇文章没有直接关系。如果硬要挖出点微言大义之类的东西，可以说是在生活中越来越强烈地体会到：人在旅途，要把握好自己是多么不容易。甚至，常常连我们到底是什么，该作什么，能作什么都未必清楚。本来已经不明白，还有那么多价格不等的工艺品在张扬“难得糊涂”，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我愿意尽力弄清自己，也了解别人，这样不断探求、不断更正的过程，构成了生命的意义，哪怕它是一道无解的方程。

这本集子，我自然希望多一些比我年轻、与我同届不惑之龄或者年长的读者朋友能够翻它一翻乃至认真读上几篇。这对于作者当然是至关重要的，就像观众席上如果不太稀落，运动员会更带劲些一样。我想，在书中主要揣摩现在式社会人生的“人间烟火”，记叙记者编辑和其他笔墨人的“高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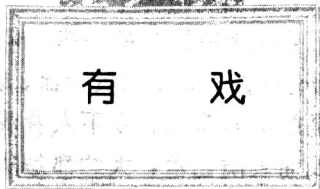
标点”，带有自叙传色彩的“人之初”，以及随遇而写的景与人的“不再陌生”各辑里，他们或许会各有所获。倘若能够让人从中找到一点似曾相识的自身影像，若有所思，那就最好不过了。

在新闻圈中，操散文笔的人日见其多，和我同在一口大锅里吃饭的几位同事，均乐此不倦。报人写散文，既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又是一片大可耕耘的开发区。记者的优势在于整体感受和快捷捕捉，我的作品尚未做到这一点，但愿和同道同志的朋友一起努力。对于报人而言，新闻是丈夫，一朝出嫁，从一而终；散文是情人，心有所移，却不能朝夕与共。能和散文缪斯柏拉图式的挽着手散它几次步，也算是缱绻风流吧？

谢谢。

1992年中秋前夕

于成都玉林村



有 戏

长达十年的时间，在中国的舞台上就只有几出“样板戏”。就看样板戏也罢，全国也就那么几个“样板团”，广大观众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70年代初期，乘着“普及样板戏”之风，各地纷纷以

“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名义，趁机恢复和新建了众多的剧团、文工团，走村串镇，煞是热闹。我当时在县里知青中被认为是支笔杆子，既然是笔杆子，也就应该会写剧本、编节目，于是招工后便进了县宣传队，充任专职创作员。

我在宣传队呆了四年，这四年大体是知青生活结束到“文化大革命”告终恢复高考的过渡阶段。小舟泊岸，知向谁边？全然不知道还会有今天这样壮观的海阔天空。所谓“创作”，是再僵化不过的机械作业，大好光阴，除去正二八经讲恋爱以外，便只有散散淡淡地在戏窝子里看戏了。

城里人难侍候，不把宣传队放在眼里。纵是演的样板戏又怎样，比浩亮、刘长瑜、袁世海他们差之远矣。我们宣传队是由新招的知青加上老川剧团的一些人组合而成，以样板戏为主，也演些歌舞节目，样板戏既唱京戏，也移植为川戏。城里的观众给取了个外号叫“京歌川”，喻其非驴非马不伦不类，领导听到却大喜，在总结工作时把它解释为群众对宣传队“一专多能”的“生动赞扬”。

宣传队真正得意的场所是在乡场上。每到一地，总有轰动效应。海报一贴，农民过节。人人喜气洋洋，呼朋唤友，邀亲结邻，“今晚黑有戏！”“明天来看午场！”气壮如牛，仿佛

这戏班子是自家办的。街上店铺小摊的生意，不消说也水涨船高，陡然热闹起来。

乡镇上有剧场的不多，但几乎都有简陋戏台。台下是露天场子，多功能。物资交流、晾晒农作物、召开群众大会，再就是放电影演戏。乡下人看戏，多半是这样的坝坝戏。中国的戏曲表演艺术，大约都是从这一类的场所中走过来的，至今也还离它不得。

演出自然是有钟点的，但并不严格。农民有自己的“太阳牌”表，太阳落坡了，这才邀邀约约有说有笑地上路。戏台上等急了，便敲锣鼓，叫“闹台”。一而再，再而三，第三通响，相当于最后通牒：再不来就开演了！闹台锣鼓催得途中疲沓街上邋遢的人紧了脚步，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坝坝里便开了锅。

戏台下面总有些板凳椅子早早占了地盘，能入座的多是当地有头有脑有场镇户口至少在场上有亲朋好友的。入得座来，便满面春风，左顾右盼，就像现在能享受卡拉OK包厢，或是向坐进高级轿车的城里人一样。场内多数人得站着，坐立之间，总有些落差。坐立结合部的摩擦，是剧场秩序混乱的热点，犹如当今世界的波斯湾。还有一种热点，比坐立的纠纷远为悠久永恒，超越阶级矛盾路线斗争，人类产生便与之俱来的，是异性的相吸。哪一处地方都有众所公认的男女精英风流代表，衣着超前，举止惊俗，当时被称为“操哥”“操妹”的。操妹的旁边，总有操哥去挨挨擦擦，操哥操妹的旁边，总有望梅止渴热心起哄的泼皮后生“打围”。台上演戏，台下也演戏，到难以相安之际，红袖章也无济于事。不用担心，这时总会有尊神出动，往往是当地乡村干部中权威极大，

名气最响，且能出口成章，语言生动，“荤”“素”俱来得的角色（总有这样的人）。跳将上台，拍拍麦克风，朝台下指名道姓日妈捣娘一番，于是秩序井然。这弹压有功的领导上台来，往往也就不再下去，蹲在台角，将半个屁股吊在台边，显示着某种威仪。也有控制失灵的时候，那领导便指挥台上掉转追光灯，极强的白光扫射过去，将场子里那些不安分者“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曝光法有效也有限，最大的副作用是引得光圈之外的观众波浪般起伏张望，阵阵起哄，这又酿成新的混乱。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无为而治，你闹你的，我演我的。锣鼓、管弦、唱腔、歌舞、嘈杂、调笑、吆喝、龙门阵，汇成坝坝戏独有的乌合之声，它的独特魅力与刺激，令场内观众如鱼得水，好兴奋，好振作！戏台下的这种热情与演出的内容全然无关，决不意味着对节目的某种抬举或是褒贬。农村是广阔的天地，过于广阔便生出无端的寂寞，好容易凑到一起来了，不挤一挤，笑一笑，热一热，闹一闹，更待何时？

最令人们激动的是演出时突然停电。“啊——”的一声齐唤中，包含着遗憾，更多的是惊喜，全场顿时活跃。人们一边“操”着供电所的八代祖宗，一边相互敬烟点火，伸个懒腰，结伴上厕所。最高兴的是青勾子娃娃伙，从大人裤裆下满场窜，装出尖声鬼叫。最扎劲的呢，当然是青年女子身边的那些青年男人，大声地发表剧评或者其它演说，竭力引起目标的注意，也有不声不响趁黑搞小动作的，引起鲜花丛中不时唤出几声惊叫和咒骂。宣传队的青年曾有奋袖捋臂想要挺身而出的，却被当地干部制止，说是“不告不理”，一个巴掌拍不响，龟儿子些就这个德性。果然，也当真没有人来救

援告状。久而久之，听出那女声叫骂，竟带着几分得意和欢喜。坝坝戏是决无退票一说的，停电太久，乡里便会张罗出几盏煤气灯之类的照具来，凑合着往下演。有几次还差十来分钟便要结束了，索性叫指挥台下亮出众多电棒（手电筒），胡乱罩住舞台，演完了事，观众散场，反说今天看得安逸。

宣传队的“创作员”，有也不多，无也不少。演《平原作战》了，是新起的准样板，大戏。演员不够，领导找到我，客气地让我“支持”一个角色，并大方地让我在革命群众和日本军官中二者挑一。我僵脚僵手的，上台即出丑，但队里医生、会计、美工、道具师傅都上阵了，尤其让人不能推却的是领导本人也已身先士卒扮了个鬼子兵。于是，爽快地叛国，穿上了日本军官的黄呢大衣。剧情中我这中级军官能指挥宣传队领导扮演的日本兵，但在更高阶层的皇军司令面前却只能低头“嗨噫”“嗨噫”（是），这也是我仅有的台词。一日在琵琶场演出，这是个楼阁式的戏台，高高在上。出场之后，看领导在我面前低眉顺眼毕恭毕敬的模样，忽然忍俊不禁，表情错位。一旁的司令官见势不妙，连骂我几声“八格牙鲁”（混蛋），这是台词之外的提醒。我更感滑稽，竟乐不可支地放声大笑起来，笑得浑身哆嗦，难以自控，只好一声嗨噫转身退下场去。按老规矩，这种事故叫塌场。当时没有奖金，也就无从经济惩罚，只是撤掉“官”职，让炊事员取而代之，极宽大的了。后来又演《杜鹃山》，也是大场面，我又被等而次之地充任匪兵。匪兵比军官其实更难，要会踩着锣鼓点子跑龙套，还得弄枪弄棒一番，最终被雷刚的大刀或柯湘的神枪解决。一排练便乱了大家的阵脚，只好下台，从此不登大雅之堂。

老吃单位的闲饭，心中有愧，便自告奋勇去帮忙守门收票，无意之中，长了不少的见识。

在剧场守门，真是个好差事，可以使人如观走马灯样充分领略到一个地方一处社会。做作家梦的人真值得来这里把细打量，你可以看到小官太太比小官更神气，卖肉的比卖盐的更威风，种皇粮的比吃皇粮的更谦卑，民办教师比公办教师要寒伧，讲恋爱的比偷情的更拘谨……形形色色的各样人等从面前走过，走过一部乡镇风情图。不同形态的衣着、姿式、风度、语言、动作，活现出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使我觉得最为有趣的是观察那些混票者，每场总有几十上百这样的勇士与智者，他们总有办法终归能从你眼皮子下大摇大摆地进去，你枉费心机想要堵住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地方领导以及和宣传队业务、生活有关的公安、供电、广播、银行、食品站、供销社等等部门单位不消说是必须打点的，重要角色光临，宣传队头头还要上前欢迎。这些人都是早早便送了票的，但他们的亲属呢？宣传队住在某家旅馆，服务周到的服务员带来的人呢？今天你去卫生所打了针，医生来了总不能不给面子吧？昨天才拿着批条在商店买了牌价肉牌价烟，眨个眼睛就认不得售货员姐妹了吗？还有，一个县的，宣传队成员在乡镇难免没有个三亲六戚，这应该算是“内部”吧？剧场里总住有人家，他说他就住里边你难道一个个去查户口？看他提着吃食手端茶盅趿着拖鞋，大大咧咧地向你点头八成也真住里头。至于那些既楚楚动人又落落大方的本地西施，你能忍心拉下脸给人家过不去么？再有一种既非领导又无实权也没关系且貌不惊人的，死死纠缠，最终你烦了，还得让他进去“找人”。其实，这些人物都不是掏不起那一两角票钱的。

能无票进场，是一种待遇、一种面子、一种本事、一桩艺术、一门学问，足以令人庆幸陶醉的。守来守去，真正能够抵挡的，大约只有真想看戏却又真没钱的老实人了。还有些惹得起的二三流土操哥，偏不让进，看他怎么办！这些人场场都来，聚在门口人多了也兴风作浪，也叫人头痛。我建议分而治之，以毒攻毒，选其中有号召力的帮助维持秩序，开演再进场。这办法颇灵。这些义务门卫很尽职，张大嗓门整顿高峰人流，满头大汗。由此可见办法得当，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门卫也有权，可以随心所欲放人进场。我对那些围在门边羡慕慕煞又无可奈何的小娃娃，在演出开始之后常施这样的仁政，因为自家小时候也和他们一样，常常守着剧场打哈欠，等着看演出结束前敞开大门时的最后几分钟“罢脚戏”。

离开宣传队的那一年元旦，在怀德区演出。我没去剧场，留在住地看书。我们住在区公所，这里是全镇山坡最高点。倦了推窗，揽进一轮好圆的月亮。望下去，脚底山坳是尚在高潮之中的剧场。丝竹管弦，隐隐入耳，五彩灯光，把我的同事们辉映成天上人间的绝妙佳人一代天骄。这如诗如画的景象使我久久入神深深感动。此时，所有的嘈杂，所有的喧哗，都全然化解在这如梦如幻仙境般的乡戏之中。



DUN WU REN SHENG ZHU GUANG QI DAO DUN WU REN SHENG ZHU GUANG

家乡富顺的百姓喜欢看热闹，热热闹闹地看热闹。

热闹之最或者说看热闹之最是什么？你猜猜。

热闹之最

很多人都没猜出来。热闹之最，不是耍龙灯舞狮子，不是端午节划船抢鸭子，也不是露天坝放免费电影、街头围观爆米花、饭馆门口逗酒醉鬼……这些都不是。

热闹之最是——看杀头。

准确些说，是看处决犯人。早些年辰是用大刀砍头，后来科技进步，便用子弹了，叫枪毙。从人道主义出发，也不打头了，而是从背部射入洞穿前胸，干净利落。人们叫惯了，仍然唤作杀头，在川南又称“敲砂罐”，把人的脑壳，比喻为砂罐，表明它的确不堪一击。

家乡的人恐怕少有未曾看过敲砂罐的。一有刑事，众人雀跃。即使像我这样不喜欢凑热闹的，记忆中也有过好多回耳闻目击的刑场纪实。

第一次是五十年代末在县城西面的罗汉洞广场，不知道为什么让我们小学生也去参观。被杀的是一个记不清姓名的历史反革命。宣判前，他一直垂着砂罐弯腰站着，当审判长把我过去只在戏台上看过的写有犯人姓名的纸“标子”用大红朱笔一勾，扔下台来时，他突然挣扎起来，大呼“冤枉”。早有准备的刑警将这犯人挟紧拖往广场一角，他一路喊冤不止，后来竟呼叫了一阵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这使同学们大为惊诧困惑。教师说，这充分表明了阶级敌人垂死挣扎

的狡猾性。

第二次是六十年代初，犯人姓曾，是刚解放时本地的土匪头子，他和原国民党七十二军六九七团起义部队中的一些人勾结，杀害了 27 名解放军派到该团的军代表。曾犯是潜逃多年终于落网的。大约自知恶有恶报，一声不吭就进了地狱。刑场上没有高潮，好些人看得不过瘾。

这两回都是先开公审大会然后就地正法的，进场有组织，场外有岗哨，秩序井然。闲杂人等只能远远地翘首观望，等那一声或数声枪响，方才缩回伸长的脖子。

像这样的情况，多数观众看不到“敲”，就退而求其次看尸体。不知道是不是有意示众，尸体常常要搁置一两天。人们便赶来围观。尸体大多是用破席子草草遮住的（后来改为塑料布），其实只看得到一双穿鞋或不穿鞋的脚，但人们仍络绎不绝。娃娃们则在附近搜索，巴望找到一两粒子弹壳。

大约因为看热闹的人太多，后来改变了方法，开会归开会，正法归正法，公审宣判完毕再用汽车押赴刑场。刑场设在城郊乡下。开头是固定的地方，那样事先赶去等候的人仍然多，又改为在几处适宜的所在临时选定一地，同时声东击西，囚车开出一程再突然变换方向，甩掉沿途跟踪的围观者。虽然如此，县城地盘不大，公路出口也仅只三处，老资格、有内线的热心观众总能十拿九稳。

大多数人失掉了现场目击的机会，遗憾之余，便用了同样的热情转而夹道围观死囚游街了。县城的主街道只有沿沱江这一条，路又狭窄，车行极慢，警灯闪闪也无济于事。插着死刑纸标五花大绑的犯人便有了被人们仔细观察细加评说的最后大曝光。“文革”年间，乱世重典，敲掉的砂罐甚多，

本地和外地的布告过一阵就遍贴街头。上等的道林纸，大幅铅印，密密麻麻的红叉，看得人惊心动魄。布告作为杀头、游街的补充，成为一种时尚刺激的大众读物，甚至夜深人静，还有读者拿着手电筒在看。

我所见过的县里最壮观的一次刑事，在七十年代初期，是当时已不多见的大会、执刑二合一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原因在于：犯人张某本身就是一名法官，案情又是奸污女知青。政治、男女、法官，把人们的好奇心推向了高潮。传说此案又极富戏剧性：本来只是作某种内部处分的，张某不服，申诉、上诉，每次都加重，最后一次撞到了上边严惩迫害知青罪犯的风口上，于是从重从快，而且大张旗鼓。这一天的富顺，人人言必称张某，倾城而出，万人空巷，四面八方，大路小路，蜂拥而至，人山人海，把会场兼刑场围得水泄不通。我们后去，已经执行完毕，只见到死者乡下的妻子带着亲戚，已把张某尸体用草席裹扎，绑在滑杆上往老家抬。尸首上缚了只大雄鸡，路人说是驱邪用的，这样的恶死者，不能进家门，要直运到坟地去。这次枪决的地点令人费解地安排在城北十字岭、我们母校县里最高学府富顺二中的大操场上。四周的庄稼地不消说已被踏得一塌糊涂，百米跑道的终点旁，便是行刑之处。后来那一摊草皮长得特别野，师生们看了又恶心又害怕，好一阵没人敢起早贪黑去跑步了。那一地草坪是历届学生锻炼、散步、看书、聊天的好去处，早恋者们也在这里留下过若干青春浪漫的故事，枪声一响，莘莘学子记忆之中关于此地的缱绻诗意，从此荡然无存。

对于杀头之事，最为熟悉的大约要算我的摄影教师、老领导税清燮了。他是县委宣传部资深的新闻老干事，富顺通，